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公开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理事会特征、审计师选择与慈善基金会信  
息披露质量

研究生姓名: 梁永研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杨荣美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会计学

研究方向: 审计理论与方法

提交日期: 2021年5月30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梁永研 签字日期： 2021.6.5

导师签名： 杨荣美 签字日期： 2021.6.5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梁永研 签字日期： 2021.6.5

导师签名： 杨荣美 签字日期： 2021.6.5

# **Directors Characteristics, Selection of Auditors and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Foundations**

**Candidate:LiangYongyan**

**Supervisor:YangRongmei**

## 摘 要

“郭美美事件”“爱心妈妈”“冰花男孩”“癌症女童”等一系列负面新闻折射出我国慈善基金会监管滞后以及“慈善不透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要求增强基金会信息披露地真实性和及时性。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关乎其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建设，如果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不透明很容易导致“慈善失灵”的现象，甚至引发信任危机。理事会作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和主要治理机构，对基金会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关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为了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督和管理，有关监管机构将外部审计制度引入基金会治理体系之中，并出台了相关配套指用来指导审计人员更好地开展对慈善基金会的审计工作，使得外部审计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日渐显著，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社会组织中的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基于 2016-2019 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从理事会组织架构、外部审计等角度出发，探索了影响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因素，并研究了高质量审计师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理事会的规模、捐赠者比例对慈善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当理事会规模、捐赠者比例较大时，能够促进基金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当理事会存在“一元结构”时，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会明显降低。另外高质量的审计师在二者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能够显著抑制“一元结构”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消极影响。本文还发现，理事会治理与外部审计治理存在着替代与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高质量审计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理事会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也能缓解由于理事会权责划分不清晰所导致的代理问题。最后，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理事会组织架构对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监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筹资压力下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理事会特征 审计师选择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 Abstract

A series of negative news such as “Guomeimei”, “Love mother”, “Ice flower boy”, “Cancer girl” and so on reflect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our country's charity foundation supervision and non-transparency of charity. In this context, The growing number of the public who require the foundation to disclose transparent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Because it's transparency is equivalent to its ima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public mind, If they do not disclose information in time, fully and completely, it is likely to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charity failure” and even a crisis of trust. As the foundation'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main governance institution, they must be accountable to the authenticit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it published. In a sense, their ability to govern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it revealed.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charity foundations, the releva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have introduced the audit system into the foundation's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accompanying guidelines to ensure better oversight by auditors. While external auditors take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xternal auditor on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significant,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do.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harity foundations, collected relevant data as a sample of the study through the charity's annual work report 2016-2019, proceed from the board characteristics, the external audit institution, studies whether they will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charity foundations and whether high quality auditors will affect their relationship. Our study found that the size of the council and the proportion of donors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charity foundation, but when the chairman is also the executor, it will lead to a decline in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it announced, further more we also find that high-quality auditors can adjust their relationships.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board and the governance of external auditors. On the one hand, high-quality auditors can significantly curb the agency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hairman-CEO duality” and

remission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internal control failures; but to a degree it can replace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board.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board'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the founda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regulatory level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funding pressures.

**Keywords:** Charity foundation; Board characteristics; Auditor selection;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目 录

<b>1 绪论</b> .....	2
1.1 研究背景 .....	2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2
1.2.1 研究目的 .....	2
1.2.2 研究意义 .....	2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2
1.3.1 研究内容 .....	2
1.3.2 研究方法 .....	2
1.3.3 研究框架 .....	2
1.4 创新之处 .....	2
<b>2 文献综述</b> .....	2
2.1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	2
2.1.1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动机 .....	2
2.1.2 慈善基金会自愿披露信息的影响因素 .....	2
2.1.3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经济后果 .....	2
2.2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综述 .....	2
2.3 审计师选择对基金会的治理效应研究综述 .....	2
2.4 理事会特征与审计师选择研究综述 .....	2
2.5 文献评述 .....	2
<b>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b> .....	2
3.1 相关概念界定 .....	2
3.1.1 慈善基金会 .....	2
3.1.2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 .....	2
3.1.3 审计师选择 .....	2
3.2 研究假设 .....	2
3.2.1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	2
3.2.2 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作用 .....	2

<b>4 研究设计</b> .....	2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2
4.2 变量定义 .....	2
4.2.1 理事会特征的度量 .....	2
4.2.2 审计师选择的度量 .....	2
4.2.3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 .....	2
4.2.4 相关控制变量的定义 .....	2
4.3 模型设计 .....	2
<b>5 实证检验</b> .....	2
5.1 描述性统计 .....	2
5.2 相关性分析 .....	2
5.3 多元回归分析 .....	2
5.3.1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多元回归分析 .....	2
5.3.2 审计师调节作用分析 .....	2
5.4 进一步分析 .....	2
5.4.1 按照全国性或地方性分组检验结果 .....	2
5.4.2 按照地区发展程度分组检验结果 .....	2
5.4.3 按照募集类型分组检验结果 .....	2
5.5 稳健性检验 .....	2
<b>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b> .....	2
6.1 研究结论 .....	2
6.2 政策建议 .....	2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2
<b>参考文献</b> .....	2
<b>后 记</b> .....	2



# 1 绪 论

## 1.1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共有各类基金会 8459 家<sup>①</sup>，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慈善组织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三驾马车之一，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和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中的不足，为促进我国公共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以基金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相当严重和突出的问题。近年来部分基金会存在善款未能善用（基金会运作不规范存在善款跑冒滴漏、不当使用等）、善事未能善知（信息披露不真实、不透明等）等现象，引发了民众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真实性的质疑，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探寻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其信息披露机制优化方向是打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桎梏、将基金会建设成“玻璃口袋”的重要途径。现有文献关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多从组织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展开，认为组织规模、组织财务状况、组织筹资能力、社会诚信环境、媒体关注等因素会影响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Behn, 2008；何红渠等，2015；刘亚莉，2013；程博，2019）。然而，随着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审计制度也逐渐成熟，二者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将会更加复杂，有必要对其进行更进一步地分析。

一方面，作为慈善基金会管理者和决策者，理事会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基金会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对外部和资源依赖性较强，为了吸引更多的捐赠资源，基金会往往会通过调整理事会架构吸纳更多的理事成员扩大理事会规模，进而影响理事会的权责安排、人员结构以及理事会的综合治理能力和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

另一方面，在“郭美美事件”后，为了加强基金会外部审计工作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民政部、财政部先后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及工作指引，对基金会外部审计机构的选聘方式、经费来源、审计内容、审计报告的形式、公布期限、审计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使得外部审计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

<sup>①</sup>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1 年 1 月 4 日，全国已有基金会 8459 家。

量的影响愈加显著。

在营利部门，关于组织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在非营利领域，由于缺乏成熟的数据库相关研究还很匮乏。为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政府相关部门联合部分基金会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慈善中国、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等网站平台，对基金会治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大大解决了数据来源问题，使得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以资源依赖等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理事会组织特征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高质量审计师对二者关系影响。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本文手工搜集了 2016—2019 年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公布年度工作报告的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1）理事会作为基金会的主要治理机构，其组织架构（结构特征）是否会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2）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手段，外部审计的质量是否会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选择不同质量的审计师是否会影响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关系？

（3）在不同的监管力度下、经济发展水平下和筹资压力下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会有怎样的变化？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期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因素以及外部审计在非营利领域中的治理效应，并引导慈善基金会更理性的进行理事会成员和审计师的选聘，形成内外互补的综合治理体系，进而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 1.2.2 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了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视角，从更微观的视角检验了非营利基金会治理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虽然目前关于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大多是以理事会规模的测度理事会特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探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借鉴了颜克高（2012）年的做法，以理事会规模、一元结构、捐赠者比例来测度理事会特征，较为细致和全面地分析了理事会特征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丰富了相关文献。

第二，扩充了有关审计师选择相关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外部审计的研究视野。目前在非营利组织中，已有关于审计师选择的文献多集中于研究选择不同质量审计师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且大多数学者选择从审计师选择带来的直接影响这一视角出发，例如审计师选择对基金会财务绩效、治理水平、信息披露质量、捐赠收入的影响，而本文将审计师选择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其对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间接影响，在丰富了研究途径的同时也丰富了外部审计的研究视野。

## （2）现实意义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慈善市场，能否获得足够的捐赠资源关乎基金会的生存与发展。由于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直接影响其公信力建设以及捐赠资源的获得，因此，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对基金会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理事会结构特征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有助于基金会通过审视其内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来探索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的途径，本文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为基金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另外，本文通过分析和检验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效应，考察了外部审计师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传导机制，丰富了外部审计参与基金会治理的相关文献，也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政策、事务所拓展审计业务以及慈善组织理事会成员聘任以及外部审计师选聘等方面提供实证支持。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根据本文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框架，论文的主体主要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

第一章：绪论。首先，简单介绍目前我国基金会的发展现状、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其次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说明了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共五小节，前四小节主要是对四类文献的梳理和总结，第一小节主要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主要包括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动机、影响因素、经济后果；第二小节梳理了慈善基金会理事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文献；第三小节梳理了有关外部审计在基金会中的治理效应相关文献；第四小节梳理了理事会特征与审计师选择的相关文献，最后在第五小节对上述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首先对文中涉及的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审计师选择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并归纳了有关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分析了理事会特征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根据研究假设，在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选取了本文的解释变量（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被解释变量（理事会特征）、调节变量（审计师选择）和相关控制变量并对变量的衡量方式、本文选定的实证模型以及实证研究中所用的数据进行说明。

第五章：实证检验及分析。主要是借助 stata15.0 软件完成。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从均值、方差、最值等方面对样本数据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其次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第四章中提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并采用了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了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不同筹资压力、监管压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下二者关系变化，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重新构造了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法，将其引入本文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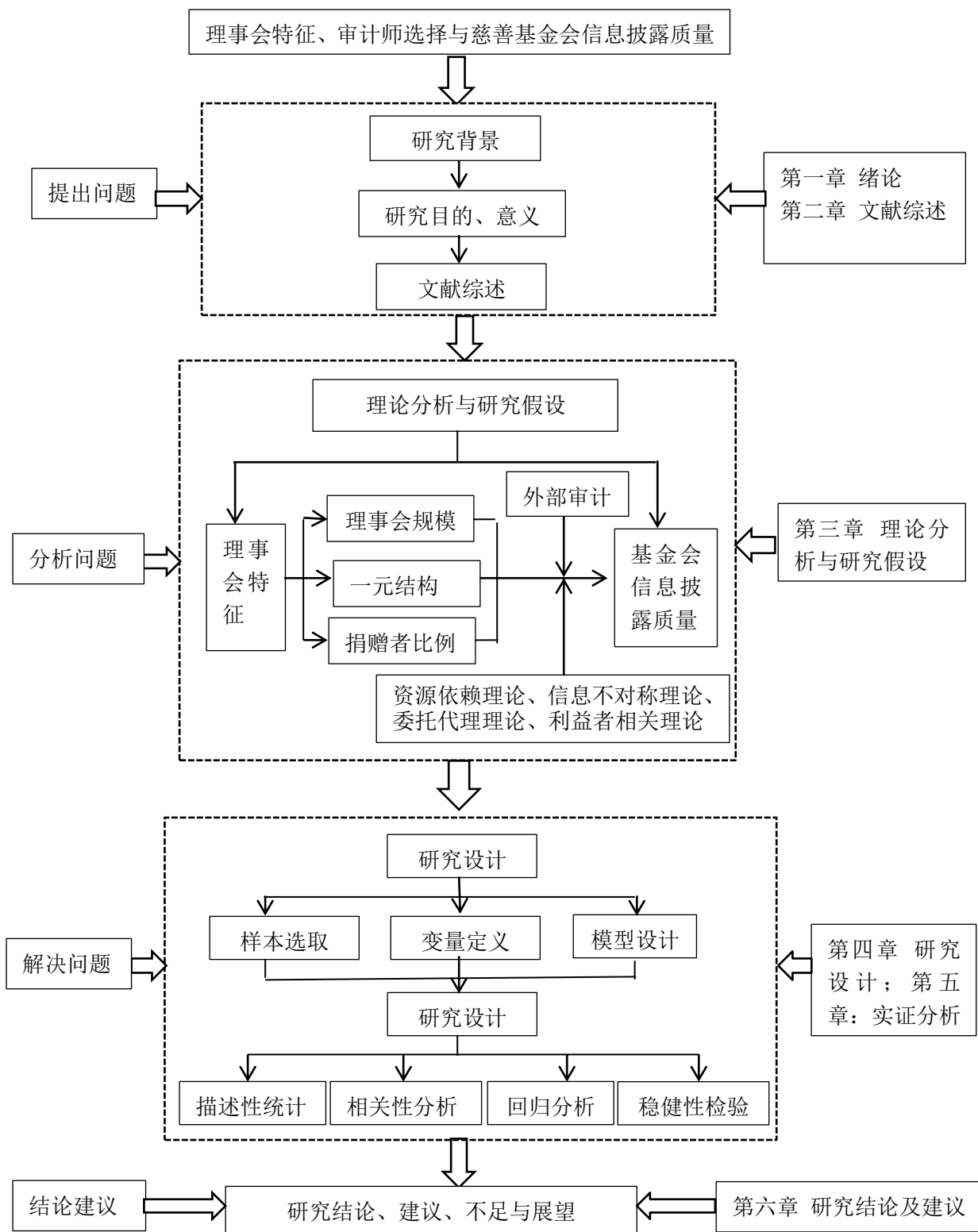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据检验结果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也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二是立足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发展现状，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完善理事聘任制度、加强基金会审计工作以及构建综合治理机制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 1.3.2 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主要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两种方法。首先在阅读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提炼、总结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的落脚点、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本文提出的

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考察了理事会规模、理事会成员构成、理事会一元结构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第二,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了审计师选择的调节效应以及在不同的监管压力、筹资压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最后采用更换信息披露质量衡量指标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文章第六部分,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1.3.3 研究框架



1.1 研究框架图

## 1.4 创新之处

本文预期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对以往研究的梳理过程中发现已有文献大多基于组织治理理论分析理事会的治理效应，且仅仅是将理事会规模、会议次数等纳入组织特征或治理特征进行研究，未严格区分基金会特征、基金会治理特征、理事会特征。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阐述了理事会结构特征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微观的视角切入，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了理事会结构特征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从调整理事会组织架构的角度，为提升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2) 本文区别已有研究审计师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影响的文献，将高质量审计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间接影响，并分析了理事会治理与审计师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为构建内外联动的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 2 文献综述

### 2.1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 2.1.1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动机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动机进行解释,并且得到了趋于一致的结论,认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行为的最终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捐赠资源。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Behn (2005) 首次提出了“慈善市场”的概念,他认为与企业类似,慈善组织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信息披露则是其在竞争中取胜的手段之一。Petrovits (2011) 等也认为,由于捐赠资源的稀缺性,数量众多的慈善组织只能通过相互竞争来取得资源,而那些公开财务信息质量较高的基金会往往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基于罗斯的信号理论, Saxton (2011) 等学者认为信息披露是慈善组织塑造良好形象的一种手段,因为捐赠者往往会将捐赠资源投给那些在公益市场中看起来更“可靠”、“坦诚”的机构。Murtaza (2011) 的研究也同样证实社会公众能够接收到非营利机构释放的“信号”,并通过这种“信号”判断组织的运作情况,进而作出“投资”决策。基于我国基金会的发展现状,颜克高(2010)、刘丽珑、陈菁(2018) 等认为捐赠者能够识别非营利组织发出的“绩优”信号,且这种“信号”能够引起捐赠者的积极反映,为组织赢取更多的资源。另外,柴振国(2017) 从激励约束相容的视角对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动机进行了分析,认为基金会进行信息披露是向捐赠者发布信号,引导捐赠者“用脚投票”。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张清(2012) 提出慈善组织扮演着“公共财产代理人”的角色,进行信息披露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具体来说,慈善组织接受了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着通过合理使用具有公益产权资产提供社会服务的使命,而进行信息披露,就是其向社会公共报告受托责任履行状况的过程,也是合理界定和解除其受托责任的过程。李健(2018) 认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动机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行为,慈善组织对外披露信息既可能是迫于合作者的压力的无奈之举,也有可能是为树立良好形象的自觉行为。



## 2.1.2 慈善基金会自愿披露信息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检验了影响慈善基金会自愿披露信息的因素。

以资源依赖理论为研究框架，Behn（2010）以美国本土基金会为样本检验了基金会自愿披露财务信息的影响因素，他的研究表明那些对捐赠资源依赖性更强、资产负债率和费用补偿率更高的非营利组织往往更愿意披露信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领域的基金会披露信息更有可能提供财务报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Rodriguez（2012）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基金会公布信息的意愿与组织规模、组织年龄、公共资金等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 Dainelli（2013）等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其研究表明具有较大规模、收到捐赠资金金额较大的非营利组织更注重和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另外，基于制度理论，Saxton & Guo（2011）的研究结果发现，基金会规模越大其在网站公布财务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而当组织处于较为贫困或密度水平较低的地区时，会减少信息披露。Tremblay-Boire&Prakash（2015）的研究则关注了外部监管环境与基金会自愿公布信息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在报纸上曝光度较高的、规模较大的基金会会更主动地披露其运作信息，并且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意愿存在行业异质性，与宗教相关以及医疗类的基金会倾向于披露更少的信息，而教育类的基金会则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

以我国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刘志明、张兴杰（2013）发现是基金会否选择主动在网络上公布信息的决策是综合考虑自身管理费用率、捐赠依赖度等因素后作出的。舒岳（2015）、Lin nie（2016）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政府的资助与控制，并认为接受更少政府资金以及在政府控制较少的情况下运营的基金会更有可能自愿披露运作信息。

## 2.1.3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经济后果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经济后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捐赠资源的获得

Parsons(2007)的研究表明,捐赠者能否直接获取有关慈善基金会资金运作、项目开展等信息会直接影响捐赠者的捐赠决策。Gandia(2011)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发现捐赠者在作出捐赠决策时,往往比较青睐那些详细披露善款来龙去脉以及相关项目运作信息的慈善组织。以台湾基金会为研究样本,林江亮(2009)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能够带来更多的捐赠资源,即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其后续获得的捐赠资源也越多。刘亚莉(2013)、刘丽珑(2018)等在考察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与捐赠收入的关系时引入了外部审计这一变量,并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对其捐赠收入的积极影响仅存在与公募基金会,且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强化信息披露质量与捐赠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

## (2) 缓解组织信息不对称,提升组织绩效

Chen(2008)认为慈善组织与捐赠者的信息不对称是阻碍捐赠者作出捐赠决策的重要原因,而通过主动披露信息,慈善组织能够建立起与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的桥梁,进而缓解慈善组织信息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林东海、刘丽珑(2019)利用财务指标建立了组织绩效的衡量指标,用中基透明度作为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了更为严格科学的研究,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确对组织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筹资压力下存在显著的区别。徐阳(2019)则利用层次分析法从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可得性、主动性四个维度出发重新构建了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体系,并检验了信息公开对于慈善基金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质量与组织的稳定性、管理效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 2.2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综述

在理事会特征方面,国内外学者集中研究了理事会关注领域、治理水平、理事会勤勉度等因素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刘丽珑、刘组基、颜梦洁等人的最新研究开始关注理事成员的异质性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Parsons(2007)指出理事会关注的服务群体、成立年限以及资产负债率会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显著影响。Gregory(2011)则认为非营利组织为完成社会使命而制定的组织战略、组织的债务承担水平、组织策略、理事会治理水平(理事会绩效)这四个维度对理解基金会信息披露水平至关重要。Saxton G.D

(2011)更多的关注了组织的财务绩效和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财务杠杆、收入规模、理事会规模以及外部理事成员比例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吴海燕、舒岳、颜克高、刘丽珑等学者以我国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开展了相关研究。吴海燕(2015)以我国高校教育类基金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影响教育类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结果表明基金会的规模、理事会人数以及基金会属性等与教育类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舒岳(2015)更多的关注了组织治理结构的影响,研究了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人数、勤勉度与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发现较大规模的理事会能够显著提升基金会信息透明度,监事会人数、理事会勤勉度对基金会透明度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尹飘扬、杨雪梅(2015)认为当前我国慈善基金会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充分、监管乏力、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与基金会的规模、组织范围以及理事会的关注领域显著相关。刘丽珑,李建发(2015)则重点关注了基金会组织特征、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治理机制、明确的职责分工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程博(2019)则将研究视角转向自媒体的治理效应,并通过检验是否开通官方微博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验证了自媒体在慈善领域中的治理效应。

在理事成员异质性方面,刘丽珑、纪益成(2019)通过衡量理事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地位来度量理事的社会资本,并将其纳入影响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模型中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理事社会资本对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和公募基金会中会更为显著。刘组基(2020)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了理事会社会化程度对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发现理事会社会化程度越高,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且在不同的制度环境、竞争压力下,二者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异。颜梦洁(2021)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政府对基金会的资助与控制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效应,发现理事会政治关联与媒体监督对基金会透明度均存在积极的影响,并且,媒体监督不仅对基金会透明度存在直接影响,还能够通过正向调节理事会政治关联与基金会透明度的关系发挥间接效应。

## 2.3 审计师选择对基金会的治理效应研究综述

审计作为一种鉴证服务能够缓解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并向市场释放一定的信号。目前,关于慈善基金会审计师选择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且多以研究审计师选择与捐赠者的反应为主。Kitching (2009)、张立民(2012)、陈丽红,张龙平(2014)等的研究表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与基金会后续能够获得的捐赠资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明辉(2019)认为“郭美美事件”对我国慈善组织外部审计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会更加关注外部审计师对基金会财务信息发布的审计意见,并且发现“郭美美事件”发生后,那些聘请“百强”审计师进行审计的基金会后期获得的捐赠资金明显高于那些聘请“非百强”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基金会。也有学者通过研究高质量审计师对基金会组织绩效、代理成本的直接影响证明了外部审计在慈善基金会中的治理效应。吕先镛(2014)、孙乾(2017)等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提升组织绩效,那些聘请“百强所”进行审计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率更低。徐丽萍和刘洋(2019)发现在慈善组织也存在着代理问题,主要表现在融资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低估上,而当基金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时能够显著抑制基金会内部的费用错报行为。

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高质量审计师在基金会中的治理效应并不理想。舒岳(2015),百强事务所在基金会的治理中效用并不明显,因为是否选择百强事务所并不会影响基金会的评级结果,并指出基金会应该更多的从内部经营方面寻求提升透明度的途径,特别是加强对管理费用的审查。同样,以2010-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刘丽珑(2015)的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师并不会影响基金会的FTI得分。

## 2.4 理事会特征与审计师选择研究综述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主要决策机构,因此影响基金会审计师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应是理事会特征。Abbott(2004)的研究也证实理事会规模越大、参与组织治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基金会进行审计。通过进一步的探究,Thomas E. Vermeer, K(2006)发现规模较大,拥有审计委员会、获得政府资助的

基金会更有可能聘请“四大”进行审计。Harris（2018）认为非营利组织中是否选择本地的行业专业审计师与理事会的治理质量、规模、独立性显著相关。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是否选择“四大”进行审计与慈善机构的理事会规模无关（Karen Kitching, 2009）。利用我国基金会样本，刘亚莉，解露莎（2014）检验了我国慈善基金会接受财务报表审计的影响因素，并发现基金会是否选择审计师进行审计与理事会会议频次、基金会是否拥有监事会、基金会的注册地以及是否接受政府补助等因素显著系相关，在区分基金会的性质后，发现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更愿意接受财务报表审计。

## 2.5 文献评述

随着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关于其信息披露质量文献也越来越丰富。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大多数学者选择从基金会组织特征出发，主要研究了基金会规模、负债水平、管理效率、注册地、理事会规模、会议次数、关注领域等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并未严格区分组织特征与理事会特征，而是将理事会的规模、会议频次等纳入组织特征的研究框架，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分析了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刘丽珑（2019）、刘组基（2020）的研究虽然从更微观的角度出发，但其关注的更多的是理事会成员的个人特征而非理事会的结构特征，关于理事会组织架构的特征是否会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需要更为细致的讨论；其次，在审计师选择方面，关于审计师治理效应的研究多从组织绩效（刘丽萍等，2019）、捐赠收入（张立民，2015）等角度出发，关于高质量审计师是否会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的文章仅有两篇，且都是以2011年以前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而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相关监管机构也加强了对外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管，在新的外部环境中，高质量审计师是否会影响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还需进一步地探讨；最后关于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政策建议，已有文献也是多从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信息披露平台等方面给出，外部环境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审视其内部管理中的不足之处，提升其管理水平才能使基金会真正实现透明化运作。

因此，本文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研究框架，分析了理事会

结构特征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高质量审计师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论证说明，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我国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现状，提出改进我国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对策建议。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慈善基金会

目前关于慈善基金会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基金会中心的定义：慈善基金会是介于政府与营利组织之间的，拥有一定资本金的，由理事会或托管人负责的公益性组织。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基金会，因此本文采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所作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sup>①</sup>。依据《条例》基金会按照募捐方式可划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又可进一步分为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

#### 3.1.2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

##### (1)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

本文将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行为定义为：慈善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组织网、基金会官网、官方微博、相关报纸媒体上自愿披露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运作信息的行为。为了规范基金会信息披露行为，促进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相关监管部门也发布了若干法律法规。现按照发布机构和法律效力将其整理为图 3.1。从图 3.1 可以看出，我国对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标准设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指引等方面，这些指标在法律效力、强制力等方面均不同，由此也构成了我国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格局：自愿披露+强制披露。以上标准主要明确了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时间、主体、原则、内容等，但这些标准并没有明确基金会信息披露更为细致的内容和格式。另外，基金会如果未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披露，其后果和处罚也不清晰。

<sup>①</sup>国务院. 基金会管理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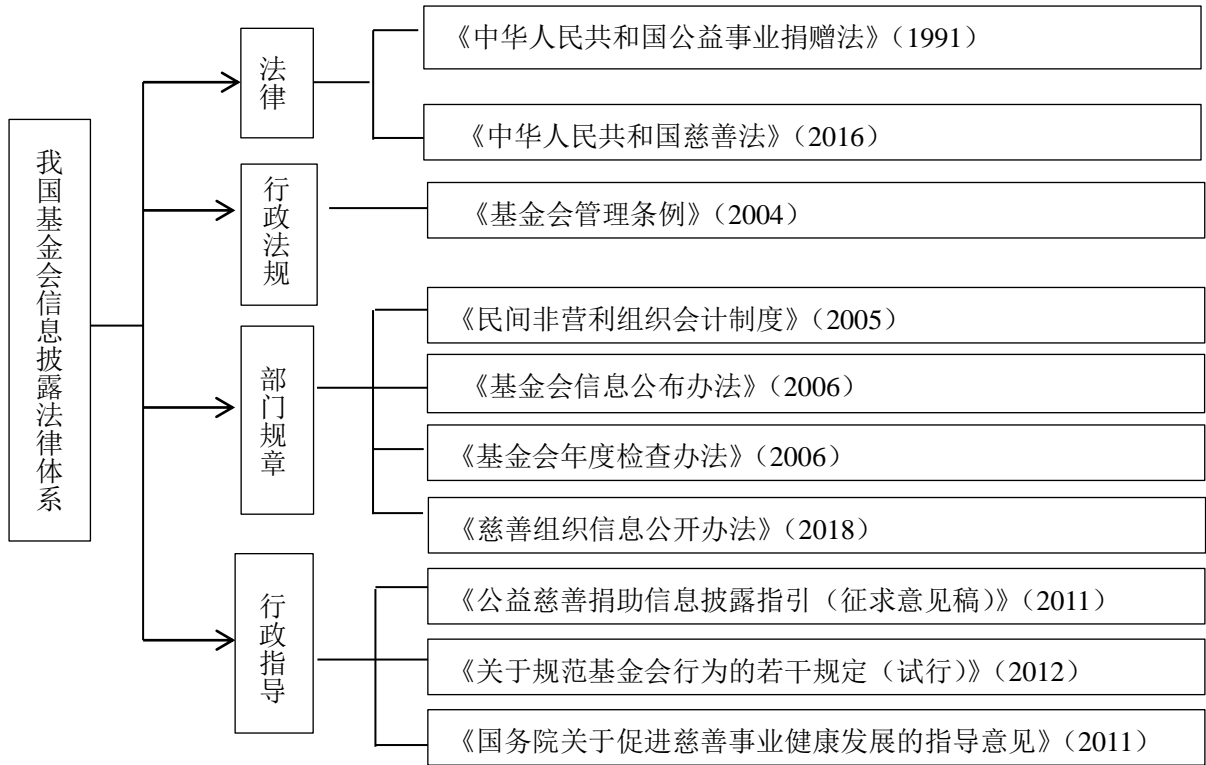


图 3.1 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结构

(2)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内容本身的质量；二是信息表述的质量；三是披露是否及时。信息披露的质量首先体现在内容质量上，即组织对外公布的信息是否完真实、完整、相关可靠；其次是信息的表述是否清晰明了，易于理解；最后，信息是否按时披露便于获取。目前，在非营利组织中，常用的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权威机构发布的评价指数，二是学者利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但无论是权威的评价指标还是学者们构建的评价体系，均包含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易得性等要求，这也是本文研究所选取的角度。

3.1.3 审计师选择

审计师即为慈善基金会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明，选择不同质量的审计师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有着不同的影响（洪金明，徐玉德 2011）。为了规范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审计工作，民政部颁布了相关



文件，明确规定了基金会选择事务所的聘用范围和选聘方式<sup>①</sup>。但有关社会组织监管机构无法干涉基金会选择什么样的审计师，这就赋予了基金会部分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是否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最终由基金会自行决定。因此，本文将审计师选择界定为基金会对于审计师的自由裁量权，即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或是低质量审计师。

## 3.2 研究假设

### 3.2.1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监管决策机构，主要负责基金会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对执行层的监督。在综合考虑以往研究成果和本研究的现实需要后，本文将主要研究理事会规模、理事会结构、理事会成员构成等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 (1) 理事会规模

资源依赖理论用于解释慈善基金会理事会组织架构具有很好的适用性(颜克高, 2012)。慈善基金会是一种非常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组织, 其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仰赖社会的供给, 在这种条件下, 理事会被认为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机制。为了从社会环境中吸取更多的资源, 理事会积极调整自身组织架构, 通过吸纳更多“社会精英”加入理事会, 建立起良好的公益品牌, 以期扩大基金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本文认为大规模的理事会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 规模较大的理事会中存在名人、名士的几率较大, 这些名人名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 具有较高的声誉。但声誉的形成和维护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他们会通过积极参与基金会治理来避免其声誉受损。当基金会运行状况良好时他们期望通过积极地参与基金会治理活动向社会媒体传递其热心公益的良好形象; 而当基金会运行状况不好时他们也希望通过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 降低自身声誉受损的风险(刘丽珑, 2019)。其次, 理事会规模越大, 理事会成员具有不同专业背景、从业经历的可能性就越大, 理

<sup>①</sup> 财政部. 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 第三条: (一) 选聘范围: 对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实施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进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上一年度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 100 名; 或具备三年以上(含三年)从事基金会或其他非营利组织审计工作经验。

事会成员之间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的互补作用越强(Dalton&Daily, 1999; 周泽将, 2007), 理事会在做出决策时能够考虑更多的意见使决策的过程更加规范, 决策的结果也更加科学合理(张振新等, 2011)。最后, 较大规模的理事会代表着更广泛的利益, 能够通过更有效的监督降低理事长操纵理事会的风险, 抑制基金会代理问题(谢晓霞, 2017), 促使信息披露的过程更加规范。

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大规模的理事会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 Saxton (2011) 以台湾非盈利医疗机构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与具有小规模理事会的基金会相比, 拥有较大规模理事会的基金会更能负担信息披露的成本, 其进行信息披露的意愿也更强; 而后 Saxton&Guo (2013) 的研究表明, 理事会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的及时性、真实性等方面做得更出色。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较大规模的理事会能够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质量并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理事会正式成员人数越多, 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越好。

## (2) 理事会“一元结构”、捐赠者占比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慈善基金会被称为“没有股东的企业”。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分析, 我们会发现在慈善组织中也存在着代理问题(Fama&Jensen, 1983)。慈善基金会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 捐赠者、基金会、理事会、基金会执行层以及受益人。基金会发起人出于扶贫济困等公益性目的成立基金会并接受社会公众的捐赠承担起提供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 并成立理事会负责贯彻和执行基金会的公益使命, 由秘书长负责具体公益项目的管理和公益资金划拨。但人性是复杂的, 理事会和执行层可能会出于享乐的目的贪墨善款或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资助者违背基金会的宗旨; 同时由于基金会内部所有者缺位和受益者虚化, 使得慈善组织中的代理问题更为隐秘、代理链条更长也更为复杂(王名等, 2005), 而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制衡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缓解基金会内部代理问题。

根据《基金会章程》的规定, 基金会理事长领导理事会负责组织战略制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 执行长由理事长任命, 负责组织日常事务的协调, 且理事长与秘书长的职权不能重叠。另外, 出于建立合理有序的分工与制衡机制的要求, 理

应由不同的人担任理事长与执行长，从而确保组织不相容职务的分离与制衡。当理事会中存在兼任现象时，一方面会破坏基金会内部的牵制机制，导致基金会内部控制失效，容易造成基金会对外披露的信息在生成和传递环节中漏报、错报、瞒报等问题降低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理事长同时兼任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角色，理事长有能力也有动机通过披露虚假信息来掩盖其不当行为。

问责是缓解代理问题的另一种途径。Fama&Jensen（1983）认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捐赠者以类似于营利组织中董事会的大股东，对非营利组织的效率、信息披露等方面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Dainelli（2012）的研究也表明，在没有股东的情况下，问责的水平是由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权力决定的。理事会成员主要由基金会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会长等共同推荐选取，如果理事会成员中包含了较多的“出资者”理事会将更具“慈善性”和代表性。首先，当理事会中包含了较多“利益相关者”时，能够增强其对理事会问责的意愿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代理问题。具体来说，捐赠者作为委托人通过加入理事会的方式参与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中，能够促使理事会更加勤勉地履行自身职责，使得基金会的公益使命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同时，当理事会捐赠者比例较大时，作为出资人，也会更加关注其“财产”的使用状况，会对基金会各项支出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促进基金会各项工作和信息披露的规范性，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其次，为了持续地获得捐赠资源，理事长与执行层也会积极履职，加强与“投资人”的联系，通过积极主动地汇报工作和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缩小双方的信息差距，提升“投资人”的后续捐赠意愿。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当理事会中存在着“一元结构”时，会破坏基金会原有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其信息披露质量，而当基金会中包含了较多的“出资人”时，出于“公益使命”理事会能够更好的行使监督权，并通过更严格的审查提高其对外披露的信息的质量。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理事会中存在“一元结构”的基金会，其信息披露质量更低

**H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理事会捐赠人比例越大，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 3.3.2 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作用

为了解决慈善领域中的代理问题,相关监管机构将外部审计制度引入基金会治理中,期望通过专业的审计服务对基金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相关管理者的受托责任进行鉴定,提升基金会内部管理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降低基金会内部的代理成本。谢晓霞(2017)的研究表明高质量审计师的确能降低基金会内部的代理成本,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高质量审计师能够影响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发挥调节作用。首先,基于审计的鉴证职能,高质量审计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能够以更独立、更专业的姿态对基金会的财务信息进行客观的评价,其发表的审计意见也更具权威性。相关研究也证明,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且会对公司股价、投资决策、信贷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廖毅刚,2012;赵宝卿,2015)。在慈善组织备受关注的今天,如果高质量的审计师认为慈善基金会的财务报告存在不实信息并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必然会在慈善市场中引起剧烈的反应,损害基金会的形象。相较于理事会规模较小的基金会,拥有较大规模理事会更加爱惜自身声誉,在审计的过程中会积极主动配合审计师的工作,同时也会根据审计师的意见对其披露的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以防止自身声誉受损。其次,审计具有威慑作用,能够减少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张俊民,2019)。当基金会理事长兼任执行长时,会破坏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理事长有可能操纵理事会并通过伪造会计信息掩盖其不当行为。基于声誉理论和审计“深口袋”理论,高质量的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和更为谨慎严格的风险态度,倒逼理事会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减少错报、漏报、瞒报的可能性。最后,审计能够缓解委托代理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基金会理事成员多来自基金会外部且身兼数职,无法亲自参与到基金会的日常运作中,这就增加了理事长与理事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审计师会更严格地执行审计程序并保持更谨慎的职业态度,在风险评估环节和业务执行过程中会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避免审计盲点的出现;同时,为了缩小与理事会的期望差距,也会积极地与理事会主动沟通,并向理事会如实报告基金会的运作情况,增强其他理事成员对基金会的了解,也使得理事会能够充分理解审计师的职责与义务,降低其声誉受损的风险。张立民(2012)、吕先

锴（2014）、孙乾（2017）、徐丽萍，刘洋（2019）等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师与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组织绩效、管理费用率、费用错报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外部审计的介入能够发挥治理效应，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证据。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质量审计师在基金会治理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并提出假设 4 及其子假设：

**H4：**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审计师能够发挥调节效应

**H4a：**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审计师能够正向调节理事会规模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关系；

**H4b：**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审计师能够抑制“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关系。

**H4c：**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审计师能够正向调节理事会捐赠者比例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关系；

## 4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基金会中心网、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各基金会的官方网站,由手工收集完成。鉴于我国部分基金会工作披露报告尚不完善,本文仅以参与民政部评估并获得评估等级的基金会为样本,同时,多数基金会仅公布了近三年的工作报告,因此本文从2016年开始收集数据。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数据不全或数据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样本;(2)剔除只有一个和两个年度数据的基金会样本;(3)剔除1%和99%分位数之外的异常值。表4.1—4.5是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1是按照基金会行业分类结果的描述性统计。2006年底,为了推进我国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民政部立足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在借鉴和参考联合国采用的国际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分类体系,并按照该体系将我国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基金会)划分14个门类<sup>①</sup>。但由于本文仅以基金会为研究对象,且研究样本有限,为了更加具体的反映出基金会的行业特征,本文借鉴了张立民(2013)年的做法,按照基金会的关注领域,将其分为教育和科学研究、安全救灾、创业就业、动物和环境保护、儿童青少年及老年人、法律、扶贫助学助困、公益事业发展和志愿服务、国际事务发展、文化艺术和体育、残疾人救助、以及卫生健康和医疗救助12类。各行业基金会数量及占比如表4.1所示:

表 4.1 基金会按行业分类描述性统计结果

行业分类	样本数量	比例 (%)
教育、科学研究	148	37.3
安全救灾	60	15.2
创业就业	10	2.7
环境和动物保护	7	1.8

<sup>①</sup>联合国采用的国际分类体系将社会组织分为:经济、科学研究、社会事业、慈善和综合五个大类。工商服务业、农业及农村发展、科学研究、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生态环境、社会服务、法律、宗教、职业及从业者组织、国际及涉外组织、其他14个门类。

续表 4.1

行业分类	样本数量	比例 (%)
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	31	7.8
法律	3	0.8
扶贫、助学、助困	40	10.1
公益事业发展	25	6.3
国际事务	14	3.5
文化艺术、体育	22	5.5
残疾人救助	22	5.5
卫生健康、医疗救助	14	3.5
合计	396	100

从表 4.1 中可以看出，我国基金会行业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其中教育类、安全救灾、以及贫困扶助类的基金会占比最多，占比最少的是特殊行业和环境动物保护类的基金会。

表 4.2 是按照年度分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2019 年度基金会样本数量较少，说明我国部分慈善基金会未严格遵守《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表 4.2 基金会按年度分类描述性统计结果

年度	样本数量	比例 (%)
2016	396	30.4
2017	396	30.4
2018	396	30.4
2019	112	8.8
合计	1300	100

表 4.3 是按照注册地区分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在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加直观的反映出地区发达程度与慈善事业之间的关联，本文参照王雷等人的研究成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划分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sup>①</sup>，并按照基金会的注册地进行了分类统计，相关分类的结果的描述性统计表 4.3 所示：

<sup>①</sup>按照王雷等学者的划分，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欠发达地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落后地区包括内蒙古、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表 4.3 基金会按地区发展程度分类描述性统计结果

地区发展程度	样本数量	比例
发达地区	265	67
欠发达地区	96	24.2
落后地区	35	8.8
合计	396	100

从表中可以看到，注册地在发达地区的基金会占比最大，与基金会中心网披露数据榜单中披露的各地基金会数量状况相符。同时，也说明地区发展程度与当地慈善事业发展程度存在密切的关系。

表 4.4 是根据评估等级分类的描述性统计。按照民政部的评估结果我国基金会共分为 1A 级—5A 级五个等级<sup>①</sup>。基金会按照评估等级分类的描述性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基金会按评估等级分类描述性统计结果

基金会等级	样本数量	比例
5A	100	25.3
4A	152	38.4
3A	125	31.6
2A	17	4.2
1A	2	0.5
合计	396	100

从表中可看出，3A 级-4A 级的基金会占样本总量的大多数，说明 3A 级及以上基金会在规模、治理水平以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更具优势，也说明这些基金会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等方面做得更好。

表 4.5 是根据募集方式分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按照募捐方式，我国基金会分为公募、非公募两种，公募基金会可面向公众募捐，非公募基金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按照募捐范围公募基金会可进一步分为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由于公募基金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也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监管，例如我国《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明确要求公募基金会对外公布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必须经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非公募基金会则不作强制性的要求。按照

<sup>①</sup>民政部会根据《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对基金会进行评估，并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公布评级结果。民政部按照实施办法确定的评估标准，从基金会的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以及社会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将参评基金会划分为 1A 至 5A 五个等级。



募集方式分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5 研究样本分布情况表（panelD：按募捐方式分类）

募集方式	样本数量	比例（%）
公募	200	50.5
非公募	196	49.5
合计	396	100

## 4.2 变量定义

### 4.2.1 理事会特征的度量

颜克高（2012）认为理事会特征是指：某个非营利组织所特有的显著区别于其他理事会的象征和标志。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赋予了理事会不同的特征。已有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理事会规模、会议次数、年龄、性别、职业背景、从业经历以及捐赠者比例等方面。基于以下原因，本文主要从理事会规模、一元结构以及捐赠者比例三个方面测度理事会特征。首先，理事会作为基金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治理机构，理事会规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其治理水平和决策能力，进而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其次理事会的一元结构反映了理事长和执行长之间的职权分配，执行长负责基金会对外披露信息的加工处理，理事长负责信息的审核，二者都处于基金会信息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二者之间权责划分会影响其对外披露信息的质量；最后捐赠者比例的大小决定了理事会的监督意愿，当理事会代表着更广泛的利益群体时，会通过更好地执行审核和监督职能提升其对外披露信息质量。

### 4.2.2 审计师选择的度量

本文将审计师选择界定为基金会对于审计师的自由裁量权，即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或是低质量审计师。但目前并没有衡量审计质量的直接指标，国内为学者较为常用的方法是采用间接指标来测度审计质量，诸如事务所规模、“非标准”审计意见、财务重述、审计费用、盈余质量等（赵艳秉，张龙平 2017）。由于慈善组织会计处理过程较为简单，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包含的信息较少，相关费用

也并未严格区分,未将审计费用单独列示;同时相比于企业,基金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审计的过程中事务所对基金会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也多为标准审计意见,无法通过审计收费、盈余质量、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审计意见等衡量审计质量。考虑到以上原因,本文拟采取事务所规模衡量审计师质量,另外,考虑到基金会模较小,业务较为简单,选择“四大”或“十大”进行审计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参照张立民(2010)、陈丽红(2014)等的做法用事务所是否被列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来度量审计师质量。

### 4.2.3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

目前关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测度主要有利用官方发布的指数和学者自主构建评价体系两种方式。其中,官方发布的指数包括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GTI指数)<sup>①</sup>、中国慈善透明指数<sup>②</sup>、中国慈善基金会榜<sup>③</sup>、中基透明指数(FTI)等,构建评价体系的学者有周咏梅(2013)、游春晖、厉国威(2015)、纪纲(2014)等。

本文选择以中基透明指数来度量基金会信息信息披露质量,原因如下:(1)相比其他指数,中基透明指数在更新频率较高,且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如张立民、刘亚莉、张龙平等。(2)相比于学者自建指标,中基透明指数由独立的第三方基金会中心网发布,在收集数据和指标计算是拥有更高的独立性和更强的专业水平,其发布的数据更为可靠和客观。

### 4.2.4 相关控制变量的定义

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行为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行为,因此,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也是多层面的。基金会规模是影响其信息披露意愿和质量的首要

<sup>①</sup> GTI 指数 USDO 发布。该体系涵盖了组织基本信息、治理与管理信息、项目信息、财务信息四个维度,包含 58 个三级指标,得分在 0~100 分之间,得分越高,则表明该组织透明度越高。该指数得分通过《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公布,但至今仅发布了 2014 年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报告。

<sup>②</sup> 中国慈善透明指数由中民慈善捐助中心在 2011 年底正式发布。该指数包含了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以及完整性、及时性、易得性三个维度,由 71 个指标构成,满分为 100 分。中国慈善透明指数通过《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公布,覆盖了慈善会、基金会、红十字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五大类。但至今,中国慈善透明指数仅更新到 2014 年。

<sup>③</sup> 该榜的具体评价体系并不对外公布,根据已披露的资料可知,该榜的评分指标总分为 100 分由基本信息、筹款信息、项目执行信息、年度财务信息、日常信息披露以及披露频次构成。其中,基本信息占 20%、筹款信息占 20%、项目执行信息占 26%、年度财务信息占 9%、日常事项披露占 12%、披露频次占 13%。

因素 (Saxton G.D,2011; Dainelli,2012),一方面较大的规模意味着基金会负担信息披露所需的各种设施成本、人力成本的能力更强,信息披露对其造成的经济压力较小;另一方面,大规模基金会的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渠道建设也更为成熟,在基金会管理和信息传播方面更具优势,这就决定了其信息披露的质量较高。其次是组织的年龄,在基金会中,组织年龄被认为是一种声誉和能力的积累,组织存续的时间越长,其在管理经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积累的经验越多,有助于其信息披露的意愿和质量的提高 (Rodriguez, 2012; Dainelli, 2013)。再次, Saxton & Guo (2011) 的研究表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还与组织的财务绩效和组织所处的地域相关,包括组织的负债水平、收入集中度、管理费用率等。最后,以我国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张立民 (2015)、刘丽珑 (2019)、刘祖基 (2020) 等的研究发现,组织特征、理事会社会资本、基金会社会化程度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在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存在显著的差异,而相关规章制度也对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责任、义务、设立条件等方面做出了严格区分。综上所述,为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保证本文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本文控制了组织规模、组织年限、收入集中度等因素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及名称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信息披露质量	fti	本文以 Fti 指数衡量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解释变量	理事会规模	num	理事会正式成员的数量
	理事会“一元结构”	dou	哑变量,若存在兼任的现象则取 1,否则取 0
	理事会捐赠者占比	sd	理事会成员中主要捐赠者占比
调节变量	高质量审计师	aud	哑变量,事务所为选择“百强”所则取 1,否则取 0
控制变量	组织年龄	age	基金会成立年限
	基金会所处地区	area	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区、欠发达地区
	基金会规模	size	基金会资产总额的对数
	募捐范围	charge	哑变量,若为全国性基金会则取 1,否则取 0
	基金会募捐方式	offer	哑变量,若基金会为公募基金会则取 1,否则取 0
	基金会收入集中度	ic	基金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基金会管理效率	eff	基金会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
	基金会资产负债率	lev	基金会负债总额比资产总额
	行业	Ind	基金会所属行业,总共 12 个行业
	年度	Year	基金会所属年度,总共 4 个年度

### 4.3 模型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构建了以下模型：

$$fti = \beta_0 + \beta_1 num + \beta_2 age + \beta_3 area + \beta_4 charge + \beta_5 offer + \beta_6 ic + \beta_7 eff + \beta_8 lev + \varepsilon \quad (1)$$

$$fti = \beta_0 + \beta_1 dou + \beta_2 age + \beta_3 area + \beta_4 charge + \beta_5 offer + \beta_6 ic + \beta_7 eff + \beta_8 lev + \varepsilon \quad (2)$$

$$fti = \beta_0 + \beta_1 sd + \beta_2 age + \beta_3 area + \beta_4 charge + \beta_5 offer + \beta_6 ic + \beta_7 eff + \beta_8 lev + \varepsilon \quad (3)$$

## 5. 实证检验

### 5.1 描述性统计

表 5.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从信息披露质量 (fti)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总的来说较好。中基透明指数平均值为 74.90 分,与刘丽珑(2019)、颜梦洁(2021)的研究结果接近<sup>①</sup>,说明本文在数据搜集过程中较为规范,不存在明显误差。但较 2019 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平均值(51.34)存在较大的差距。可能的原因是:(1)在数据筛选过程中由于部分得分较低的基金会在中组网披露年度报告较为简略,且其对外公布的信息的渠道有限,无法查询到更多的信息,因而本文仅保留了那些信息披露较为充分的基金会;(2)与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数据相比本文的样本量较小,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 fti 指数的平均值的样本包含了在我国成立的大多数基金会,但由于本文获取数据的途径有限,仅搜集到 396 家基金会的样本数据,导致其均值较大。从表 5.1 中也可看出,基金会 fti 得分最大值为 100 分,最小值为 7.6 分(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样本间方差较大,表明样本的波动较大,也进一步说明了目前我国慈善基金信息披露质量良莠不齐的现状。

其次,从理事会规模(num)的统计结果来看,均值为 12.53,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 5-15 人的要求,其中,理事会成员最多的为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当年理事会正式理事成员人数为 28 人,理事会成员最少的是达拉特旗人民教育基金会,仅为 2 人,超过 50%的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达到了 11 人以上。从“一元结构”(dou)的统计结果来看从大约 17%的基金会中存在着理事长兼任执行长的现象,表明部分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可能存在问题。从捐赠者占比(sd)统计结果来看,理事会成员中包含捐赠者的基金会数量较少,均值仅为 0.024,最小值为 0,表明理事会成员中没有包含捐赠者,最大值为 0.727,表明理事会总人数中捐赠者在占到了 72%。就基金会的分布情况来看,分布在发达地区的基金会数量较多接近总样本的 50%;从募集方式来看,样本中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基金会占比相当,公募基金基金会中大约 30%的样本来自全国性基金会,选择百强

<sup>①</sup> 刘丽珑在《理事社会资本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这篇文章中,得出的 fti 的均值为 82.8194,颜梦洁在《政治关联与非营利组织透明度:自媒体监督的调节效应》一文中得出的 fti 均值为 78.10,均与本文的均值较为接近。

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基金会约占 23.1%。基金会间资产规模(size)、成立年限(age)、收入集中度(ic)、资产负债率(lev)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管理费用率(eff)的均值接近 7%，表明样本中大部分基金会符合管理费用占比不得高于 10%的规定<sup>①</sup>。

表 5.1 样本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p50	min	max
fti	1174	74.90	21.01	75.60	19.60	100
num	1174	12.53	5.794	11	2	28
dou	1174	0.170	0.375	0	0	1
sd	1174	0.024	0.084	0	0	0.727
aud	1174	0.230	0.421	0	0	1
area	1174	2.566	0.647	3	1	3
age	1174	11.96	7.793	9	2	34
size	1174	17.30	1.502	17.19	14.16	21.31
charge	1174	0.311	0.463	0	0	1
offer	1174	0.509	0.500	1	0	1
ic	1174	0.822	0.673	0.919	-0.021	9.672
eff	1174	0.069	0.179	0.033	-2.947	2.723
lev	1174	0.020	0.055	0.001	-0.365	0.444

## 5.2 相关性分析

表 5.2 列出了本文主要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初步了解基金会理事会特征与其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可以通过观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否大于 0.6，初步判断主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sup>①</sup> 民政部. 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第七条: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表 5.2 变量间相关系数表

变量	fti	num	dou	sd	aud	age	size	ic	eff	lev	area	offer	nature
fti	1												
num	0.146***	1											
dou	-0.145***	0.143***	1										
sd	0.167***	-0.088***	-0.035	1									
aud	0.250***	0.018	-0.001	0.097***	1								
age	0.024	0.231***	0.192***	-0.117***	0.007	1							
size	0.289***	0.323***	0.013	-0.008	0.239***	0.274***	1						
ic	0.096***	0.024	-0.046	-0.012	0.068**	0.028	0.003	1					
eff	-0.089***	-0.101***	-0.013	0.077***	-0.041	0.057*	-0.134	-0.053*	1				
lev	-0.066**	-0.062**	0.005	-0.026	-0.056*	0.077***	-0.028	-0.003	0.003	1			
area	0.226***	-0.024	-0.052*	0.063**	0.275***	0.070**	0.233***	-0.011	-0.029	0.048	1		
offer	-0.001	0.269***	0.163***	-0.180***	0.016	0.469***	0.159***	0.047	-0.065**	0.104***	-0.155***	1	
charge	0.167***	0.138***	0.024	0.041	0.363***	0.212***	0.357***	0.037	-0.047	0.003	0.263***	0.160***	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5.2 中可以看出,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fti) 与理事会正式成员数量 (num)、理事会中捐赠者占比 (sd) 等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理事会“一元结构” (dou) 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理事长兼任执行长确实会弱化理事会的监督职能,降低其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导致其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另外,高质量审计师 (aud) 与 fti 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50,表示外部审计制度能够在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发挥治理效应,选择百强事务所进行审计确实能够促进基金会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控制变量中,地区发达程度 (area) 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26,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基金会间的竞争越激烈,而通过披露高质量的信息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获得更多的捐赠资源。是否为公募基金会 (offer) 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大,但基金会对社会捐赠的依赖能力 (ic) 与其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募集范围 (charge) 与 fti 得分之间的系数为 0.167,表明在更严格的监管制度下,全国性基金会会自觉约束其自身行为,并更积极的对外披露质量更高的信息。从表中也可看出,基金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 (lev)、管理费用率 (eff) 越高其 fti 得分越低,表明基金会自身的财务状况也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

表 5.2 中,是否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与基金会是否为全国性基金会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63,表明全国性基金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意愿更强;基金会成立年限与基金会是否为公募基金会的相关系数为 0.469,说明我国的公募基金会成立时间较早,这也符合我国基金会从官办到民办的发展历程;基金会规模与是否为全国性基金会相关系数为 0.357,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明显低于 0.3,可以初步判断本文的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5.3.1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多元回归分析

表 5.3 列示了理事会特征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多元回归结果。从表 5.3 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出,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fti) 与理事会规模 (num) 系数显著为正,假设 1 得以验证。一方面说明了相比于理事会成员较少的基金会,较大规模的理事会确实能够对理事长和执行层起到牵制和监督作用,降低理事长操纵



理事会的可能性，促使基金会披露更多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较大规模的理事会能够使理事成员之间在专业技能、业务知识等方面起到互补作用，发挥群体决策的优点，使得组织的决策更加科学，并增强其对外公开相关信息的意愿。

“一元结构”（dou）的系数显著为负，假设 2 得以验证。说明与现代企业一样，慈善组织内部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因此作为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理事会会长与作为执行层主要负责人的秘书长应由不同的人员担任，若二者职能重叠，容易导致其内部制衡机制失效，为理事长的自利行为提供便利的条件，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影响组织信息的透明度。捐赠人比例（sd）系数显著为正，假设 3 得以验证，说明当理事会成员中包含“出资人”、捐赠者时能够增强理事会对执行层的监督意愿，促进基金会规范运行，在财务支出核算上也会更加谨慎透明，促使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地区发展程度（area）系数显著为正，一方面说明我国基金会的发展与地区发达程度紧密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捐赠能力和捐赠意愿越强，基金会的数量、基金会获取的捐赠资源也越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基金会处于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会主动提升其信息披露的质量，以吸引更多的捐赠资源。组织规模（siz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较大规模的基金会内部管理能力和信息传播能力较强，因而拥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同时也说明，大规模的基金会会更加重视自身形象的建设，而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增强其公信力。

表 5.3 理事会特征与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多元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fti	fti	fti
num	0.304*** (2.82)		
dou		-7.470*** (-4.88)	
sd			35.202*** (4.99)
age	-0.173* (-1.95)	-0.085 (-0.96)	-0.144 (-1.63)
size	3.246*** (7.27)	3.520*** (8.24)	3.462*** (8.01)
ic	2.694*** (3.18)	2.447*** (2.91)	2.812*** (3.33)

续表 5.3

VARIABLES	(1)	(2)	(3)
	fti	fti	fti
eff	-3.883 (-1.20)	-4.749 (-1.48)	-5.284 (-1.64)
lev	-24.675** (-2.36)	-27.606*** (-2.67)	-26.094** (-2.52)
area	5.279*** (5.48)	4.999*** (5.26)	5.139*** (5.39)
offer	-1.321 (-0.95)	-0.455 (-0.34)	0.305 (0.22)
charge	1.457 (1.05)	1.462 (1.06)	1.188 (0.86)
Constant	-1.548 (-0.21)	-1.642 (-0.22)	-2.443 (-0.33)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174	1,174	1,174
R-squared	0.190	0.203	0.198
Pseudo R2	0.174	0.187	0.181
F	11.73	12.82	12.24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5.3.2 审计师调节作用分析

本文采用了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了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作用。表 5.4 列示了高质量审计师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在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的样本中，理事会规模（num）的系数为 0.492，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在低质量审计师的样本中，理事会规模（num）与信息披露质量（fti）系数为 0.192，理事会规模对基金会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不具显著性，表明在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时，规模较大的理事会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和治理效应，假设 4a 得以验证，但两组样本之间的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调节效应存在但不明显。在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样本中，“一元结构”（dou）与 fti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在审计师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一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fti）的系数为负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分样本组间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chi2 的值为 4.72，p 值为 0.029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师能够对理事会“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关系起到抑制作用，假设 4b 得以验证。与

假设 4c 相反, 当选择低质量审计师时, 理事会捐赠者占比 (sd) 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 而在高质量审计师的样本中, 二者存在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审计师的治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捐赠者”治理效应。虽然捐赠者对理事会的“问责”能够促进基金会信息质量的提升, 但当基金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时, 其治理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相比于高质量的审计师, 由于缺乏财务相关知识和相关行业经验, 捐赠者可能无法识别理事长或执行长较为隐蔽的舞弊行为或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错报和漏洞, 而高质量的审计师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敏感的职业判断, 通过更专业的审计服务能够发现和识别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和舞弊行为。同时出于对自身声誉的保护, 也会更加积极的应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各项风险疑点, 通过更多的实质性程序, 保证其审计意见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其次, 由于基金会理事成员多来自基金会外部且身兼数职, 亲自参与到基金会的日常运作的时间较少, 容易听信理事长或执行长的“一面之词”, 而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对基金会的财务报告和理事长的经济责任进行评定, 因此, 其治理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高质量审计师的治理效应与“捐赠者”治理效应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 当基金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时, 审计师的治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捐赠者的治理效应, 也就是说高质量审计师会负向调节捐赠者比例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正向关系, 且这种调节效应是明显的。(chi2 值为 3.92, p 值为 0.047,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5.4 高质量审计师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VARIABLES	Aud=0	Aud=1	Aud=0	Aud=1	Aud=0	Aud=1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num	0.192 (1.64)	0.492** (1.99)				
dou			-6.841*** (-3.91)	-2.082 (-0.71)		
sd					46.109*** (4.38)	22.843 (1.48)
age	-0.191* (-1.86)	-0.327* (-1.84)	-0.114 (-1.11)	-0.225 (-1.29)	-0.211** (-2.07)	-0.195 (-1.09)
size	3.520*** (6.62)	1.141 (1.29)	3.685*** (7.21)	1.671** (1.98)	3.751*** (7.24)	1.693* (1.91)

续表 5.4

VARIABLES	Aud=0	Aud=1	Aud=0	Aud=1	Aud=0	Aud=1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ic	10.411*** (4.82)	7.772 (1.53)	9.812*** (4.58)	7.323 (1.42)	10.627*** (4.94)	10.473* (1.87)
eff	-7.532 (-1.09)	2.947 (0.23)	-9.546 (-1.40)	1.366 (0.10)	-6.792 (-1.00)	5.454 (0.41)
lev	-23.969 (-1.64)	-37.336 (-1.26)	-26.271* (-1.82)	-33.978 (-1.12)	-26.797* (-1.87)	-35.028 (-1.15)
area	5.511*** (5.25)	2.968 (0.77)	5.358*** (5.16)	1.774 (0.47)	5.522*** (5.32)	1.627 (0.41)
offer	-3.259** (-2.07)	2.501 (0.93)	-2.472 (-1.60)	2.824 (1.04)	-1.422 (-0.91)	3.344 (1.20)
nature	-1.095 (-0.65)	10.370*** (3.63)	-1.134 (-0.68)	10.870*** (3.77)	-1.755 (-1.04)	10.201*** (3.36)
Constant	-10.268 (-1.11)	37.987** (2.18)	-9.792 (-1.07)	37.800** (2.15)	-4.193 (-0.47)	25.195 (1.35)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860	257	879	268	845	243
R-squared	0.210	0.228	0.131	0.099	0.226	0.219
Pseudo R2	0.188	0.156	0.122	0.0672	0.205	0.141
F	9.671	3.147	14.57	3.136	10.43	2.806
Chi2		1.33		4.72**		3.92**
Prob>Chi2		0.248		0.029		0.0477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5.4 进一步分析

### 5.4.1 按照全国性或地方性分组检验结果

按照开展募捐活动的区域和范围,我国公募基金会进一步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基金会,全国性基金会开展募捐活动的范围更广,承担的社会救助责任更大,受到的社会关注也更为广泛。同时,社交媒体也具有治理效应,李晗、张立民(2015)指出,社交媒体监督能够在全国性基金会的治理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因此,在多方主体的关注下,全国性基金会面临的监管压力也越大。表 5.5 是按照全国性和地方性基金会分组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理事会规模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在地方性基金会样本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与全国性基金会相比,地方性基金会由于募捐范围有限,往往会通过扩大理事会规模吸纳资源,且理事

会也会通过更加积极地履职和监督,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树立良好形象。由于全国性基金会受到更多的监管和关注,理事会“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在地方性样本中更为显著,这说明当外部监管压力较大时,能够规范理事长和执行长的行为,抑制其自利动机。捐赠者占比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在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中差别不大,表明基金会是否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监管扩大利益相关者在理事会中的占比都能够加强“出资人”对理事会和执行层监督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促进基金会更规范地运行。

表 5.5 按照全国性或地方性基金会分样本检验结果

VARIABLES	nature=0	nature=1	nature=0	nature=1	nature=0	nature=1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0.321** (2.47)	0.240 (1.36)				
			-10.398*** (-5.32)	-5.682** (-2.52)		
					28.263*** (3.29)	28.167*** (4.18)
age	-0.366*** (-3.25)	0.368*** (2.69)	-0.237** (-2.12)	0.430*** (3.13)	-0.368*** (-3.29)	0.410*** (3.03)
size	2.867*** (5.38)	4.651*** (6.86)	3.175*** (6.14)	4.714*** (7.49)	2.831*** (5.32)	5.137*** (8.34)
ic	1.989*** (2.85)	1.430 (1.29)	2.068*** (3.03)	1.062 (0.95)	2.146*** (3.12)	1.482 (1.35)
eff	-2.657** (-2.56)	1.774 (0.21)	-2.867*** (-2.81)	0.296 (0.03)	-2.952*** (-2.85)	3.198 (0.38)
lev	-25.675** (-2.20)	-16.855 (-1.59)	-28.625** (-2.49)	-17.497* (-1.66)	-28.540** (-2.46)	-17.627* (-1.70)
offer	0.255 (0.15)	-6.153** (-2.57)	1.435 (0.88)	-5.784** (-2.44)	1.684 (1.02)	-4.418* (-1.87)
area	4.965*** (4.40)	0.733 (0.38)	4.532*** (4.08)	0.914 (0.48)	4.930*** (4.41)	0.091 (0.05)
Constant	6.682 (0.74)	-11.391 (-0.97)	6.289 (0.71)	-9.369 (-0.80)	10.292 (1.13)	-17.096 (-1.49)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849	385	849	383	840	379
R-squared	0.157	0.393	0.181	0.399	0.163	0.416
Pseudo R2	0.134	0.356	0.159	0.363	0.140	0.380
F	6.988	10.66	8.314	10.87	7.221	11.51
Chi2		0.14		2.43		0
Prob>Chi2		0.704		0.1192		0.992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5.4.2 按照地区发展程度分组检验结果

基金会注册地的发达程度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陈丽红、张龙平, 2014), 且根据前文的相关系数表, 基金会注册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系数为 0.226, 表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存在很大的关系, 因此, 本文按照地区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样本检验。考虑到处于落后地区的基金会样本量较少(仅为 35 家), 因此, 本文将落后地区的样本纳入欠发达地区的样本中, 进行了分组检验。表 5.6 是按照地区发展程度分样本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当基金会注册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时, 理事会规模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慈善基金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大规模的理事会会更加积极地履行职责, 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达到获取资源的目的。同时,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相关法律环境也更为完善, 监管制度也更为严格, 理事会“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负向关系也被部分削弱,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相关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捐赠者占比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欠发达地区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 且分样本之间的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是由于相较于注册地欠发达地区的基金会, 位于欠发达地区的基金会受到的关注和监管较少, 且机构捐赠者较多, 而当“出资人”在理事会中的比例较高时, 能够更好地实现理事会的监督职能, 促进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以及其公益性目标实现。

表 5.6 按地区发展程度分样本检验结果

VARIABLES	Area=0	Area=1	Area=0	Area=1	Area=0	Area=1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num	0.181 (1.05)	0.397*** (2.87)				
dou			-5.537** (-2.24)	-4.923** (-2.48)		
sd					126.100*** (5.85)	20.064** (2.09)
age	-0.425*** (-2.70)	-0.147 (-1.33)	-0.357** (-2.28)	-0.054 (-0.49)	-0.413*** (-2.79)	-0.125 (-1.12)

续表 5.6

VARIABLES	Area=0	Area=1	Area=0	Area=1	Area=0	Area=1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size	4.001*** (4.14)	2.735*** (5.18)	4.275*** (4.55)	3.133*** (6.21)	4.554*** (5.03)	3.131*** (6.02)
ic	8.039** (2.19)	11.350*** (4.92)	7.353** (2.02)	10.936*** (4.71)	8.423** (2.41)	12.582*** (5.28)
eff	-21.372** (-2.01)	5.604 (0.73)	-23.327** (-2.22)	3.454 (0.45)	-19.454* (-1.94)	5.713 (0.74)
lev	-0.650 (-0.02)	-32.961** (-2.20)	-0.897 (-0.03)	-34.758** (-2.32)	-13.226 (-0.52)	-35.116** (-2.34)
charge	1.921 (0.57)	1.351 (0.87)	1.351 (0.40)	1.613 (1.03)	2.223 (0.69)	0.659 (0.41)
offer	-1.105 (-0.48)	-1.770 (-1.01)	-0.927 (-0.40)	-0.954 (-0.55)	1.934 (0.87)	0.198 (0.11)
Constant	-7.043 (-0.43)	18.043* (1.94)	-8.243 (-0.51)	15.654* (1.70)	-17.758 (-1.15)	14.434 (1.53)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84	733	385	730	384	704
R-squared	0.186	0.172	0.196	0.172	0.258	0.166
Pseudo R2	0.139	0.147	0.150	0.147	0.215	0.140
F	3.936	6.723	4.217	6.692	6.009	6.181
Chi2	1.03		0.04		23.05***	
Prob>Chi2	0.311		0.84		0.000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5.4.3 按照募集类型分组检验结果

表 5.7 是按照募集方式分样本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当基金会为公募基金会时，理事会规模与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系数为 0.307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当基金会为非公募基金会时，理事会规模与其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为 0.664 关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分样本之间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理事会规模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存在中显著的差异，在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会更积极地履行职责，提升其信息披露的质量。可能的原因是，在面对同样的“筹资压力”时，由于筹资渠道有限，非公募基金会通过扩大理事会规模吸纳捐赠资源的动机更强，相较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在慈善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的途径。无

论是在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中,理事长兼任执行长都会降低其信息披露质量,且分样本之间的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公募基金会中这种负向关系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受到更为广泛的监管,其内部的代理问题比较容易被发现,并且由于承担了更大的救助责任,一旦被爆出管理者的舞弊行为,对其公信力的损害更大。捐赠者占比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在公募基金会中更为显著,且分样本之间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相比于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的“投资者”在范围上更广,数量上更多,因而当捐赠者比例较高时,代表的利益群体也越多,对理事长和执行层问责的权利越大,能够更有效的约束其他理事成员和执行层的行为,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

表 5.7 按照募集方式分样本检验结果

VARIABLES	Offer=1	Offer=0	Offer=1	Offer=0	Offer=1	Offer=0
	fti	fti	fti	fti	fti	fti
num	0.644*** (3.68)	0.307** (2.20)				
dou			-4.602* (-1.65)	-6.283*** (-3.43)		
sd					28.241** (2.43)	57.266*** (3.10)
age	-0.177 (-0.91)	-0.106 (-1.03)	-0.062 (-0.31)	-0.047 (-0.46)	-0.258 (-1.26)	-0.074 (-0.73)
size	2.459*** (3.84)	3.355*** (4.58)	3.147*** (5.10)	3.230*** (4.56)	3.266*** (5.14)	2.996*** (4.17)
ic	12.049*** (4.29)	8.545*** (3.10)	12.907*** (4.57)	7.456*** (2.74)	14.743*** (5.05)	8.131*** (2.99)
eff	3.960 (0.37)	-4.300 (-0.33)	1.233 (0.11)	-5.160 (-0.40)	5.377 (0.49)	-4.383 (-0.33)
lev	59.322** (2.17)	-41.119** (-2.35)	54.322* (1.96)	-36.634** (-2.13)	57.640** (2.10)	-36.926** (-2.14)
charge	3.661* (1.84)	-0.571 (-0.29)	4.371** (2.15)	-0.621 (-0.32)	2.551 (1.23)	0.005 (0.00)
area	10.187*** (5.10)	7.840*** (4.18)	9.332*** (4.65)	7.435*** (4.00)	9.800*** (4.85)	7.582*** (4.07)
Constant	8.734 (0.78)	2.262 (0.18)	4.557 (0.40)	5.547 (0.45)	1.478 (0.13)	7.811 (0.63)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537	547	535	547	535	547
Pseudo R2	0.187	0.258	0.171	0.276	0.173	0.273
F	6.871	9.624	6.248	10.46	6.025	10.33
Chi2		4.67**		0.23		1.89**
Prob>Chi2		0.03		0.629		0.0168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5.5 稳健性检验

为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稳健,本文采用了重新构造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基金会信息披露渠道关乎其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和可得性,而这两方面因素也是 *fti* 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借鉴了刘丽珑(2019)的做法采用信息披露渠道代替 *fti* 指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信息披露渠道得分计算方法如下:若基金会在民政部网站披露年度报告赋值一分,若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三个渠道中的任意渠道披露信息则赋值一分,最高赋值为4,最低为0。假设1—3的检验结果如表5.8所示。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基金会信息披露渠道(*type*)与理事会规模、“一元结构”、捐赠者比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4、-0.115、1.350,分别在1%、1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主要变量的系数与符号基本与预期一致。募集方式(*offer*)与信息披露质量(*type*)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表明公募基金会更注重其信息披露渠道的建设,这可能是由于公募基金会规模较大、承担着更大的救助责任、相关部门对其监管要求也更严格。

表 5.8 变更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式进行主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ype</i>	<i>type</i>	<i>type</i>
<i>num</i>	0.014*** (3.04)		
<i>dou</i>		-0.115* (-1.76)	
<i>sd</i>			1.350*** (3.59)
<i>age</i>	-0.006 (-1.51)	-0.004 (-1.01)	-0.004 (-1.12)
<i>size</i>	0.159*** (7.72)	0.172*** (8.97)	0.175*** (9.16)
<i>ic</i>	0.557*** (6.53)	0.498*** (5.92)	0.520*** (6.19)
<i>eff</i>	0.189 (0.53)	-0.087 (-0.33)	-0.006 (-0.02)
<i>lev</i>	-0.027 (-0.04)	-0.201 (-0.36)	-0.255 (-0.46)
<i>area</i>	0.235*** (4.11)	0.150*** (3.59)	0.144*** (3.45)

续表 5.8

VARIABLE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type	type	type
offer	0.101* (1.70)	0.138** (2.37)	0.155*** (2.66)
charge	-0.084 (-1.41)	-0.055 (-0.94)	-0.070 (-1.20)
Constant	-0.732** (-2.07)	-0.977*** (-2.87)	-1.073*** (-3.16)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053	1,091	1,086
R-squared	0.256	0.237	0.244
Pseudo R2	0.239	0.220	0.228
F	15.37	14.39	14.92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5.9 是假设 4 及其子假设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当采用替代变量进行回归时，在审计师质量较高的样本中，理事会正式成员数量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更显著，但二者的组间差异不显著，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一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系数为正，且分样本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高质量审计师能够抑制由理事长兼任执行长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捐赠者占比与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在审计师质量较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外部审计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理事会监督意愿和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

表 5.9 变更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式进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VARIABLE	Aud=0	Aud=1	Aud=0	Aud=1	Aud=0	Aud=1
	type	type	type	type	type	type
num	0.205* (1.75)	0.500** (2.02)	-0.167** (-2.22)	0.013 (0.11)	1.933*** (4.15)	0.845 (1.36)
age	-0.182* (-1.78)	-0.331* (-1.87)	0.002 (0.35)	-0.021*** (-3.02)	-0.001 (-0.26)	-0.021*** (-2.87)
size	3.433*** (6.43)	1.117 (1.26)	0.192*** (8.58)	0.065* (1.89)	0.189*** (8.36)	0.081** (2.27)
ic	10.386*** (4.81)	7.682 (1.52)	0.435*** (4.57)	0.208 (1.01)	0.473*** (4.97)	0.324 (1.46)

续表 5.9

VARIABLE	Aud=0	Aud=1	Aud=0	Aud=1	Aud=0	Aud=1
	type	type	type	type	type	type
eff	-7.626 (-1.11)	2.930 (0.23)	-0.011 (-0.04)	-0.557 (-1.05)	0.068 (0.23)	-0.516 (-0.97)
lev	-22.665 (-1.55)	-37.577 (-1.27)	0.208 (0.33)	-1.521 (-1.23)	0.170 (0.27)	-1.430 (-1.17)
area	7.794*** (5.31)	4.138 (0.92)	0.178*** (2.76)	0.098 (0.55)	0.190*** (2.97)	0.040 (0.21)
offer	-2.906* (-1.83)	2.455 (0.92)	0.069 (1.01)	0.333*** (3.02)	0.119* (1.72)	0.310*** (2.78)
charge	-1.446 (-0.85)	10.252*** (3.58)	-0.185** (-2.49)	0.447*** (3.81)	-0.222*** (-2.97)	0.455*** (3.72)
Constant	0.295 (0.03)	43.384*** (2.72)	-1.068*** (-2.70)	1.577** (2.42)	-1.107*** (-2.78)	1.243* (1.82)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860	257	877	259	863	246
R-squared	0.211	0.229	0.221	0.313	0.232	0.332
Pseudo R2	0.189	0.157	0.200	0.249	0.211	0.267
F	9.705	3.162	10.49	4.882	11.04	5.047
Chi2		0.06		4.20**		4.57**
Prob>Chi2		0.8		0.04		0.03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理论支撑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炼研究的落脚点，利用通过基金会中心网收集了有关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截面数据以及来自慈善中国、中组网以及各慈善基金会官方网站的有关其内部治理和外部审计的信息，实证研究了我国基金会理事会特征、审计师选择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理事会的结构特征对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理事会规模、捐赠者占比与基金会信息披露水平在 1% 的水平上正相关。理事会规模、捐赠者比例较大时，能够提升理事会的监督意愿，进而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水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理事会规模、选择合适的理事会成员来改善基金会信息披露状况。“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水平在 1% 的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与企业类似，在非营利组织中同样存在着代理问题，而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而降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明确的岗位职责分工，强化其内部牵制的有效性，进而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

(2) 高质量的审计师确实存在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并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与理事会规模、“一元结构”存在一定的补充关系，与理事中捐赠理事占比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有效的缓解由于理事长兼任执行长所带来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抑制“一元结构”与基金会信息披露水平的负向关系。

### 6.2 政策建议

(1) 完善理事成员聘用标准，扩大利益相关者在理事会中的比例

无论是何种组织，决策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是保证其监督职能发挥的核心要素。对理事会而言，作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为了更好地进行决策提升基金会治理水平，监管当局应该积极引导基金会引入相关非营利组织治理方面的专家

以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个人,在声誉机制激励与约束下,这些理事会更好地履行理事职责,进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也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占比,尤其是与款项有直接关系的捐赠者和收益者的比例,以保证捐助款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落到实处。同时,引入利益相关者也能够敦促基金会完善款项支出审批流程,增加财务支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达到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的目的。

### (2)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慈善基金会外部审计制度

目前,慈善基金会对外披露的审计报告中包含的内容相对较少,仅包括财务报告、附注、事务所名称、注册会计师名称等,且外部审计师对基金会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大多为标准审计意见,这也使得一些基金会将审计看做是“表面功夫”,而审计师也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完善相关制度,明晰审计师的法律问责,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质量更高的审计服务。

### (3) 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一方面,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中包含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政指引等方面,但这些指标在法律效力、强制力、详略程度均存在一些差别,并且这些标准中也未包含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也使得基金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意愿降低。在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敦促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也要承担起“引路人”的角色。积极鼓励基金会成立官方网站,建立在线披露机制,引导基金会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在线信息披露平台。

### (4) 发展整体治理理念,构建综合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的内部机制以保障不同权利的制衡,是基金会治理好坏的关键。外部监管不足可能会导致基金会内部化合谋,致使“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使整个治理失效;而外部监管过于频繁也会影响基金会正常工作的开展,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要统筹监管资源,实现对基金会“少次高效”的监管;另一方面,应转变监管思维,创新监管方式,引入行业协会、媒体、社会公众等力量构建多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实现对基金会的全方位监管。但我们也要用好媒体监管这把利剑,加强对相关媒体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培训,避免媒体因言论自由而丧失监管的严肃性。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理事会特征对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高质量审计师的调节效应。但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一,在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式上,本文参考了张立民、刘丽珑(2015、2018)做法用中基透明指数作为衡量其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该指标虽然克服了GTI指数等官方指标不连续以及学者自行构建评价体系主观性过强的缺点,但关于FTI指数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真实情况还有待商榷。在今后,如何更全面、真实地评价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其二,在样本选取上,由于数据时效性和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只收集了396家慈善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且教育、科学研究类的基金会数量较多,虽然相对于已有研究,样本量已有一定的扩充,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基金会还有待进一步考察。随着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关数据库的成立(CNRDS数据库),今后在数据方面的限制会减少很多,可针对我国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行为开展更多的研究。

最后,在外部审计方面,由于在基金会审计报告中包含的信息有限,且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意见也多为标准审计意见,无法开展更多研究。相信慈善基金会外部审计制度的更加完善,未来可针对注册会计师对慈善基金会的不同审计意见开展相关研究。

## 参考文献

- [1] Lawrence J. Abbott, Susan Parker. Auditor Selection and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0, 19(2): 47-68.
- [2] Behn, B. K, DeVries, D. D., & Lin. The determinants of transparenc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2010, 26(1): 6-12.
- [3] Charles J.P. Chen, Bikki Jaggi. Associ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family control and financial disclosures in Hong Ko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0, 19 (4):285-310.
- [4] Francesco Dainelli, Giacomo Manetti, Barbara Sibilio. Web-Based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National Museums [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3, 24(3): 649-665.
- [5] Erica E. Harris, Stefanie L. Tate, Aleksandra B. Zimmerman. Does Hiring a Local Industry Specialist Auditor Matter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9, 48 (3):633-664
- [6] Fama, E. F. and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301-325.
- [7] Gregory D. Saxton, Jenn-Shyong Kuo, and Yi-Cheng Ho. The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1, (10):1-21.
- [8] Jeffrey L. Callen. Board Composition, Committees,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The Case of Nonprofits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3, 32(4):493-520.
- [9] Jense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3 (6): 831-880.
- [10] John M. Trussel, Linda M. Parsons. Financial Reporting Factors Affecting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incorporating*

-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007, (23):263-285.
- [11] Juan L. Gand á. Internet Disclosure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r Development in Spain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1, 40(1):57-78.
- [12] Lin Nie, Helen K. Liu. Explor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Voluntary Disclosure by Chinese Foundations [J].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6, 27(5):2374-2400.
- [13] Murtaza N.Putting the Lasts First: The Case for Community-Focused and Peer-Managed NGO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1, (22):1-17.
- [14] Olson D E.Agency Theory in the Non — for — profit Sector: Its Role at Independent Colleges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0, 29(2):280—296.
- [15] Parsons.L. M.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s on Contributions to Not-For-Profit-Organizations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07, (19):179-196.
- [16] Rodriguez, M. M. G., Caba Perez, M. C., & Lopez Godoy, M. Determining factors in onlinetransparency of NGOs: A Spanish case study [J].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2, (23), 661—683.
- [17] Ruoyun Hua. Political Label and Selectiv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Charity Foundations in China [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21(01):1-18.
- [18] Saxton, G. D., & Guo, C.Accountability online: Understanding the web-based accountabilitypractic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1, 40 (2), 270—295.
- [19] Saxton, GD., Zhuang, J. A. Game-Theoretic Model of Disclosure-Don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arket for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 41(1):40-63.
- [20] Stefanie L. Tate Auditor change and auditor choice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2007, 26 (1): 47-70.
- [21] Tremblay-Boire, J., & Prakash, A. *Accountability.org: Online disclosures by U.S. nonprofits*. [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5, 26 (2), 693-719.
- [22] Xie, Wallace N Davidson, Peter J DaDalt.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board and the audit committee*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3, 9(3): 295-316.
- [23] 车宣呈. 独立审计师选择与公司治理特征研究——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07, (2): 61-68.
- [24] 陈丽红, 张龙平, 杨平. 慈善组织特征、信息披露与捐赠收入[J]. *当代财经*, 2015, (11): 107-117.
- [25] 陈丽红, 张龙平. 慈善基金会特征、审计师选择与捐赠决策[J]. *审计研究*, 2014, (05): 68-76.
- [26] 陈思灼. 董事会特征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D]. 长春: 吉林财经大学, 2018
- [27] 程博. 官方微博与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 自媒体真的有治理效应吗?[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9 (07): 52-67.
- [28] 程昔武, 朱小平. 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 特征分析与框架构建[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8, (03): 87-91.
- [29] 崔伟, 陆正飞. 董事会规模、独立性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南开管理评论*, 2008, (11): 22-27.
- [30] 龚辉峰. 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11, (04): 17-26.
- [31] 何红渠, 唐丽梅, 时林娜. 公共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8 (01): 112-118.
- [32] 洪金明, 徐玉德, 李亚茹. 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 一来自深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1, (2): 107-112.
- [33] 侯俊东, 庄小丽. 捐赠者会关心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效率吗?——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 (03): 115-126+171-172.

- [34] 李晗, 汤胜, 左志刚. 民政部年度检查在基金会治理中有效吗——来自中国的初步经验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16, (05): 64-72.
- [35] 李晗, 张立民, 汤胜. 媒体监督能影响基金会绩效吗?——来自我国的初步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5, (02): 72-80.
- [36] 李健.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何以可能?——基于 PP-DADI 模型的综合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02): 130-137+206.
- [37] 李明辉, 杨鑫, 赵宁. 审计师质量、政府管制与基金会捐赠收入——基于“郭美美”事件的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9, (01): 80-92.
- [38] 李维安, 姜广省, 卢建词. 捐赠者会在意慈善组织的公益项目吗——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04): 49-61.
- [39] 李维安, 王鹏程, 徐业坤.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 18(01): 4-14.
- [40] 廖义刚. 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及其出具动因: 研究框架与研究述评[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27(05): 49-56.
- [41] 林江亮, 游筑钧. 影响非营利组织捐赠收入因素之探讨——以台湾公益团体为主[C].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2010 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五届现代会计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 2010, 470-492.
- [42] 林听, 安国样, 胡亚君. 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 2006 年至 2007 年深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财会通讯. 2010, (6): 51-53.
- [43] 林永坚, 王志强. 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13, (6): 73-83.
- [44] 刘宏鹏.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角色与责任研究——基于中美比较分析的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 2006, (01): 103-112.
- [45] 刘丽珑, 纪益成. 理事社会资本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抑制还是促进——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 财会月刊, 2019, (06): 68-76.
- [46] 刘丽珑, 李建发. 非营利组织信息透明度改进研究——基于全国性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6): 91-101.
- [47] 刘丽珑, 林东海.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能否改进组织绩效?——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为例[J]. 东南学术, 2019, (02): 148-157.

- [48]刘丽珑, 张国清, 陈菁. 非营利组织理事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 (02):76-90.
- [49]刘亚莉, 解露莎. 慈善组织性质、治理特征与财务报表审计[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 (03):73-81.
- [50]刘亚莉, 王新, 魏倩.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后果研究[J]. 会计研究, 2013, (01):76-83+96.
- [51]刘志明, 张兴杰, 游艳玲. 非营利组织在线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基金会的实证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 (11):46-51.
- [52]刘祖基, 孙淑伟, 胡浔, 何贤杰. 社会化慈善基金会与会计信息质量[J]. 会计研究, 2020, (07):38-48.
- [53]毛丽娟. 董事会特征与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1):63-69.
- [54]舒岳. 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与信息透明度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5, (17):110-112.
- [55]孙乾. 外部审计对慈善基金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7.
- [56]王伟红, 崔竹青, 刘婷. 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影响组织收入吗? ——基于公益基金会的研究[J]. 财务研究, 2020, (05):39-51.
- [57]王咏梅, 王鹏. “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市场认同度的差异性研究[J]. 审计研究, 2006, (5):49-56.
- [58]王名, 贾西津. 试论基金会的产权与治理结构[J]. 公共管理评论, 2004, (01):115-125.
- [59]谢晓霞, 明月. 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监事会与代理成本[J]. 商业会计, 2017, (08):15-19.
- [60]徐莉萍, 刘洋, 张淑霞. 外部治理机制能有效遏制慈善基金会的费用错报行为吗[J]. 财贸研究, 2019, 30(10):93-110.
- [61]徐晞, 叶民强. 从公司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基于理论基础比较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08, (22):138-141.
- [62]徐阳. 信息公开对公益基金会组织发展的影响[D]. 上海:华东师范大

- 学, 2019.
- [63] 颜克高, 陈晓春.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构建[J]. 华东经济管理, 2010, 24(12):122-125.
- [64] 颜克高.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特征与组织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D]. 湖南: 湖南大学, 2012.
- [65] 颜克高. 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与组织财务绩效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2, (01):84-91.
- [66] 颜克高. 组织特征、资源环境与理事会规模: 来自我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8(02):64-69.
- [67] 杨清香, 俞麟, 陈娜. 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9, (7):64-70.
- [68] 尹飘扬, 杨雪梅.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J]. 商业会计, 2015, (19):27-30.
- [69] 赵保卿, 郝亮. A 股与 H 股公司审计意见对股价影响的对比研究[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5, 12(01):66-75.
- [70] 张俊民, 卜美文. 公司研发投入会影响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吗[J]. 现代经济探讨, 2019, (06):86-94.
- [71] 张立民, 曹丽梅, 李晗. 审计在基金会治理中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吗?[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 15(02):92-100.
- [72] 张立民, 李晗. 非营利组织公共危机救助活动审计制度安排与创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抗震救灾审计的案例研究[J]. 审计研究, 2009, (03):3-8.
- [73] 张立民, 李晗.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基于汶川地震中 16 家全国性基金会的案例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 26(03):3-10.
- [74] 张立民, 李晗. 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综述[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2, 9(03):9-17.
- [75] 张立民, 李晗. 我国基金会内部治理机制有效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 28(02):79-88.
- [76] 张清. 试论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 法制与社会, 2012(25):56-57.

## 后 记

行文至此，心底突然涌上一丝不舍与难过，三年来的点点滴滴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奏响了那首《送别》。借此机会，我想向三年来帮助过我的老师、亲人、和朋友表达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恩师杨老师，我们的“美美老师”。初遇杨老师是在和平校区的教室中，杨老师担任我们审计学原理这门课的授课教师。杨老师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渊博的学识加深了我对审计这个专业的认识，也使得蒙哥马利、莫茨、李若山、陈汉文这些学术大家的名字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再次见到杨老师是在导师见面会上，在 2018 年的秋天，我幸运的加入了杨门这个集体，有机会能够和“美美老师”再续师生情。“美美老师”不仅为我答疑解惑，指导我确定研究方向传授“为学之道”更是以身作则教我“为人之本”。杨老师爱读书，总也要求我们多读书，读好书。每次去杨老师家，老师总是毫不吝啬的拿出自己最新购买的专业书与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对待学术杨老师也十分的严谨，无论是毕业论文还是科研论文，从选题、格式到内容，老师都会帮我们仔细的订正。在生活中，杨老师更像一个大家长，面对我们偶尔也会很严厉，但更多的是包容和支持。一位好老师，胜过万卷书，在此，谨向恩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会计学院的各位老师以及答辩组的各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其次，要感谢各位师兄师姐们，感谢师兄师姐们在学习生活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倾囊相授，也要感谢同级的小伙伴和 18 级会计学班的小伙伴，手工搜集数据的过程漫长、繁琐而枯燥，是他们在每每烦躁、焦虑时，给与我安慰和鼓励。

最后，我需要感谢我的父母，父亲曾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名言鼓励我，母亲也曾在深夜为我添衣烹茶，正是有了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才能不断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研究生生涯就此告一段落，窗外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在这个特殊的春天愿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向阳而生！